

课本赴时艰 插图也抗战 ——烽火十四年教科书插图叙事研究

余宏亮, 李欣桐

摘要: 抗战时期教科书插图的图像叙事分析, 对解码国家叙事话语方式, 洞悉国家认同的建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抗战教科书插图的叙事主题主要围绕侵略者残忍暴行、正义之师英勇风采、英雄领袖伟岸形象、全民团结抗战精神四个方面展开, 并综合运用空间叙事、顷刻叙事、象征叙事、符号叙事和情绪叙事等图像叙事策略来实现表意目的。这一时期, 国统区与根据地的教科书插图叙事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 前者具有精英主义倾向, 突出政治权威, 强调政治符号; 后者具有革命现实主义倾向, 体现全民抗战, 彰显人民主体性。在价值方面, 战时教科书插图图像叙事作为宝贵的抗战遗产, 具有参与刻画伟大抗战精神的鲜明视觉标识的文化建构价值、构筑群体层面的集体符号记忆的情感凝聚价值以及为学以报国铸牢坚实魂脉根基的育人润心价值。

关键词: 教科书插图; 图像叙事; 抗日战争; 集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660(2025)04-0118-13

人是天生的讲故事者^①, 图像与文字是人类用以记录和传达信息的最主要叙事方式。其中, 图像叙事是人类最初的叙事方式, 指以视觉符号系统(如绘画、摄影、影视等)为媒介, 通过时空结构编排、符号隐喻编码及形式语言组织等方式, 实现对事件时序逻辑与因果逻辑传达的表意实践。图像叙事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而教科书插图的图像叙事则是国家叙事的核心方式之一, 是反映国家意志、凝聚集体共识、引领价值导向的有力政治工具。抗日战争时期, 教科书插图通过图像叙事谱写了中华民族共御外敌的视觉史诗, 于方寸间投射了救亡图存的宏大叙事与全民抗战的点滴温情, 并通过文本建构、意义阐释和情感表达等信息传递活动, 发挥了记录侵略铁证、书写民族精神、宣传政治主张、凝聚抗战力量的历史作用。因此, 厘清抗战时期教科书插图这一抗战遗产的图像叙事主题、策略、特征与价值, 对于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把握国家叙事话语方式、明确国家认同建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与启示。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6批面上资助项目“中小学教材插图绘编百年史论研究”(2024M761753)。

作者简介: 余宏亮, 人民教育出版社期刊编辑室主任, 教授, 教育学博士,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北京 100081); 李欣桐, 人民教育出版社期刊编辑室编辑, 教育学博士(北京 100081)。

^① [以] 利布里奇、图沃-玛沙奇、奇尔波著, 王红艳译:《叙事研究: 阅读、分析和诠释》,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第7页。

一、抗战时期教科书插图的叙事主题

图像叙事主题即图像呈现的内容，是图像所反映的具体情节以及情节所承载的思想、情感或寓意。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一文中建立了“功能—行动—叙述”三层叙事框架。^①功能层指图像中的最小叙事单元承担的基础叙事功能，行动层指图像中的人物动态与空间关系构成的事件逻辑，叙述层则指图像中的叙事形式与方式。该叙事分析框架具有跨媒介性特征，除文学研究领域外，还广泛用于绘画、影视、戏剧等多形态叙事分析，可用以系统剖析叙事主题的建构路径。

（一）罄竹难书的侵略者残忍暴行

以此为主题的插图目的在于实现对日本侵略者系统性暴行的视觉呈现与政治控诉。例如，在商务印书馆的“复兴社会教科书”（1933）、华北书店的“初级战时新课本”（1944）等教科书中，就出现了大量反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的插图（见图1、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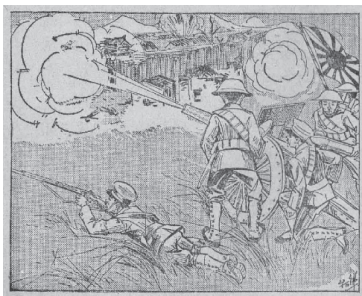


图1 1933年商务印书馆
《复兴社会教科书》（第六册）
五三惨案插图



图2 1944年华北书店《初级战时新
课本：国语常识合编》（第三册 下）
好男儿和小汉奸插图

在功能层面，此类插图基本以侵华日军为画面主体，视觉单元多为荷枪实弹的士兵个体或群体以及手无寸铁的平民形象，以此强调武装侵略者的身份和武力优势以及被侵略者面对暴力时的脆弱性。画面着力呈现战争破坏的后果，如用残破倒塌的建筑物、废墟瓦砾等环境元素表示事件场景。细节刻画上，常辅以炮火硝烟、爆炸形成的弹坑、断壁残垣以及象征伤亡的鲜血等视觉符号，系统性、具象化地展现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领土的非法入侵与占领，复现了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实施的残酷暴行。

在行为层面，图中清晰描绘了一系列日军的侵略性和破坏性行为，如使用冷兵器或火器进行的刺杀行为、以武力胁迫平民就范的逼迫行为、以军事力量摧毁建筑的爆破行为、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掠夺行为，以及强行占据中国领土的侵占行为。这一系列高度具象化且连贯呈现的人物行为，通过视觉证据直观地揭示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公然相悖的两个关键事实：一是侵略者对中国人民个体生命权与生存权的系统性、暴力性剥夺，二是侵略者对中华民族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严重践踏。

在叙述层面，此类插图常采用特定的构图策略以强化主题表达。插图画面多采用中景和远

^① 张寅德著：《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景塑造战争场面，采用对角构图营造强烈的失衡感与压迫感，精准表现了侵略者的残忍行径，客观呈现了侵略战争本身的破坏性和残酷性，暗示中国军民在极端劣势条件下进行抵抗所面临的艰巨困难和巨大牺牲。

（二）英勇无畏的正义之师风采

此主题插图聚焦呈现中国军队形象，将抽象的“正义”理念和“英雄”气概具象化，用以提振士气、稳定民心，并向国际社会展示国家的正义形象与战斗意志。如中华书局的“小学国语读本”（1934）、生活书店的“战时读本”（1938）、正中书局的“国防算术”（1945）、华北书店《民众课本》（1942）等教科书中的插图和封面，着重展示了中国军队作为“仁义之师”“正义之师”的形象（见图3、图4）。



图3 1938年生活书店《战时读本 初级》
（第一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插图



图4 1942年华北书店《民众课本》封面

在功能层面，此类插图画面的视觉元素选择具有显著指向性，集中描绘了军人在冲锋陷阵时的姿态，着力表现他们英勇无畏的精神特质。同时还在环境与氛围的营造中设置了大量战争相关的视觉单元，如弥漫的炮火、升腾的硝烟、吹响的号角、急行的装甲、严密的栅栏以及战场的白骨等象征战争残酷与牺牲的意象。这些元素的组合运用，鲜活刻画了中国军民奋不顾身、奋勇抗敌的战斗形象，构成了血肉之躯与残酷战争之间的强烈视觉张力，形象展示了中国军人反抗外来强敌的真实状态与精神内核。

在行为层面，图像中系统描绘了在日军的火力压制下，中国军队开启自卫战争的系列关键行动，包括：与敌人直接交火的对抗行为，展现正面抗敌的勇气；向敌阵无畏突击的冲锋行为，直观体现不畏牺牲的战斗意志；军官进行战术部署与领导的指挥行为，反映高效部署的组织效能；面对攻击时冷静反攻的镇定自若，凸显反抗压迫的战略定力。一系列行为将“英雄气概”“正义行动”这一抽象价值具象化，为读者塑造了中国军队的典型视觉印象。

在叙述层面，插图常以放射性线条元素表现光线、弹道和动态趋势，为读者锁定视觉中心，其蕴含的方向性与能量感直接营造出高度紧张与力量蓄势待发的视觉氛围，强化战斗的激烈程度与军人内在的爆发力。画面常采用水平构图和中心构图法，赋予画面整体稳定感与秩序感，契合军队作为有组织纪律的正义之师形象，同时显著增强了画面的空间延展感和主体的视觉厚重感，结合军人正面昂然的姿态，有力强化并传递了以“正义感”为核心的画面情感基调，促使读者产生对画面主体及其阵营的认同。

（三）伟岸光辉的英雄、领袖形象

领袖是政党形象的代言人，领袖形象是政党形象的重要表达和直观表现，基于领袖形象把党的形象人格化，是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百年探索历程中的重要历史经验。^①在战时教科书插图中，除了对英雄、领袖自然形象的客观再现，这些图像还在政权形象表征、调动情感共鸣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在中华书局“国语读本”（1935）、裕民印刷厂的“初级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1945）、韬奋书店的“战时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1945）等教科书中，领袖形象成为带有标识性的政权视觉符号，构建着战时教科书在特殊历史语境下特有的视觉文化（见图5、图6）。



图5 1948年华北新华书店《国语课标》（第一册）毛主席插图



图6 1945年韬奋书店《战时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第二册）朱德总司令插图

在功能层面，此类插图的画面主体多为政治、军事领袖的正面肖像或全身像，以及不同时代抵御外敌、挽救危亡的民族英雄画像。这些英雄、领袖形象超越了个体表征范畴，被塑造为承载特定意识形态的政治符号与凝聚集体认同的精神图腾。在抗战时期的历史语境下，这种塑造具有双重功能性指向：一是通过典型革命英雄的形象塑造，激发民众的精神崇拜，为群体提供情感与信念的聚焦点；二是服务战时的政治动员需求，利用英雄、领袖形象背后所蕴含的精神，统一抗战力量，坚定抗战信念。

在行为层面，画面主体人物的姿态或庄重肃穆、目视前方，或全副武装、整装待发，简朴的衣着反映物质匮乏时期的艰苦现实，而坚毅神情、挺拔姿态则彰显着革命领袖政治理想的崇高性与坚定性，体现了困境中卓绝奋斗意志与政治理想不可动摇的坚定理想。

在叙述层面，此类图像最大程度地隐去了除人物本体外的其他背景信息，将人物形象设置为图像绝对核心位置，忽略不必要的面部细节而着重聚焦精神刻画，以仰角塑造形象的庄严感和神圣感，并通过人物神情与外观描绘，形成了艰苦现实与崇高理想之间的对比，使人物形象成为革命信念与斗争精神的象征以及政党形象的有力化身。

（四）“卫国有我”的全民抗战精神

此类插图通过对救亡图存背景下普通群众样态的描绘，将抽象的“民族主义”转化为具象的、可操作的公民责任伦理，把“抗战”视作一项需要全体民众介入的总体性事业，从视觉层面完成对人民群众从“战争难民”到“抗战主体”的身份转换（见图7、图8）。

^① 郭国祥、向燕君：《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的百年探索及其基本经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



图7 1945年稻畚书店《战时
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
(第二册)民兵插图



图8 1945年稻畚书店《战时
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
(第四册)小孩放哨插图

在功能层面，此类插图画面以投身抗战的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与人物共同出现的不仅有田野、工坊、草房等日常劳作环境，还常带有如红缨枪、劈刀、地雷、手榴弹等典型人民武装符号，具象化了全民抗战中群众“亦农亦兵”的特殊身份形态，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战期间勇敢履行维持社会运转的经济职责与抵抗外敌的国防职责，彰显了广大劳动人民在抗战期间兼顾生产劳动和保家卫国的双重使命。

在行为层面，此类插图系统勾勒了全民抗战的多元化行动谱系，包括青年群众主动参军奔赴前线的毅然姿态，亲人扶肩送别孩子参军远行的深情嘱托，老少妇孺组装地雷、架设机枪的全民武装行动，儿童站岗放哨、工农打场运粮的自发警戒和后方补给活动等，体现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默契配合，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积极投身统一抗战、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智慧和决心。

在叙述层面，此类插图摒弃了苦难叙事、悲剧叙事的视角与方法，主动规避传统战争图像的创伤表达，放弃呈现哭泣、伤残、废墟等苦难符号，采用平视视角与均衡构图，淡化英雄主义叙事常见的仰角崇拜，使农民、妇女、儿童等普通行动者获得平等的视觉主体地位，并基于“历史由人民书写”的人民史观，构建了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的民族精神和勇毅气魄。

二、抗战时期教科书插图的叙事策略

叙事以“讲好故事”为目的。实现这一目的则需要依据一套系统性的、具有明确意图的符号操作与视觉修辞方法，对视觉元素进行选择、组织与结构化，将离散的视觉信息整合为具有内在因果逻辑、情感张力与主题深度的连贯叙事系统。这种方法与手段即图像的叙事策略。抗战时期教科书插图主要以空间叙事、顷刻叙事、象征叙事、符号叙事和情绪叙事等图像叙事策略实现表意目的。

（一）布势于图的空间叙事

地图是教科书中极为常见的图像，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地图叙事成为了教科书构建空间方位、呈现战争局势的主要叙事话语，其叙事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权疆界空间化。地图静态体空间的直观呈现，一方面清晰划定了我国与日本的地理方位与领土界限，构建可知可感的领土概念符号，强调我国固有的领土主权；另一方面，战时教科书有意通过地图和附文强调我国与日本的领土面积对比，多次在地图中将日本领土设置为深色或黑色，在客观区分国别主权的基础上，还通过色彩的视觉加权，在地图上倾注了一定的情感隐喻。二是战略态势可视化。除静态体空间，地图同时还呈现出了时空体空间，地图成为敌我两方攻防的行动域，其中包含双方在时空方位中的行动方向和运动轨迹，以方向性箭头、纹理化区域等编码符号，在空间中增加时间性要素，形成一种共时性的空间并置，实现对时局形势的直观性呈现。三是信息链条关联化。地图是一种信息高度特殊的特殊图像，除对地理空间的再现外，地图叙事更具有在时间、空间和事件上的接续化和关联化特征。战时教科书通过单幅地图或组合地图的呈现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军事、交通、资源等多重图示并置，将孤立、分散的信息点串联为具有因果关系的叙事网络，将复杂地缘关系、战略决策和宏观局势，浓缩为一个几乎可以“一目了然”的整体性视觉结构，使相关历史事件得以被直观地洞悉和把握。

（二）赋时于图的顷刻叙事

战时教科书图像叙事的另一个常用策略在于对“顷刻”这一美学概念的充分应用。教科书有意捕捉与塑造此类“顷刻”，用以实现静态画面对于事件发展趋势的高度凝练与叙述表达。具体来说，顷刻叙事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张力的瞬息凝结。插图的绘编者从教科书文本中提取出最具冲突性和典型性的瞬间作为视觉主题，依据事件要素矛盾、冲突累积至最顶点爆发的瞬时定格，为读者提供强烈的视觉冲击。二是想象空间延伸。莱辛认为，事件到达了顶点也就迎来止境，事件最具魅力的瞬间即“富于孕育性的顷刻”，这是一种矛盾冲突发展至饱和状态、无限接近但尚未达到顶点的决定性瞬间，这些将达未达的瞬间中，内部的诸种逼近临界点的状态，凝固了所有过去的因果，也包含了所有未来走向的潜能，因此，他认为“最能产生效果的只能是可以让现象自由活动的那一顷刻了”^①。战时的教科书插图中，除了战争的爆破场面，还设置有两军对峙的凝重情境、战士举枪瞄准的姿态瞬间、哨兵放哨的戒备状态等承接过去也连接未来的顷刻瞬间，读者根据插图呈现的顷刻瞬间，自然地在头脑中补全了事件发展的前因与后续，甚至使插图“活动”起来，从图像记录的时间“点”延伸为时间“段”，充分引发读者对图像的绵延想象。三是调动感官联觉。顷刻叙事往往伴随着高浓度的视觉信息，这些信息能够以视觉感官为枢纽，综合调动读者的听觉、嗅觉、触觉等多感官的通感与移觉，从而深化其对战争情境的身体化理解与情感记忆，进一步提升教育传播的效果。

（三）寓理于图的象征叙事

叙事是事理的高度统一^②，“事”是叙事的物质基础与依附载体，“理”是叙事的精神内核与深层逻辑，事理统一，则是通过具象的事件序列来承载和演绎抽象的规律与价值，并达到

① [德] 莱辛著：《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

② 马忠著：《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7页。

“事实”与“价值”、“现象”与“本质”、“感性”与“理性”的有机融合。相较于平铺直叙的叙事手段，教科书插图更倾向采用象征叙述，以学生熟知的视觉素材构筑图像意义，将道理“溶解”于一个自洽、圆融、鲜活且富有感染力的意义世界，并以强大的视觉说服力完成对抽象概念的说明与传递。在战时教科书插图中，象征叙事策略主要表现为隐喻与讽刺两种形态，含蓄又锐利地传达出作者对时局的深刻洞察与社会呼吁。一是以寓言解构宏大叙事的隐喻叙事，用“小现象”讲“大道理”。例如，插图绘制了“两羊过河”“鹬蚌相争”“野牛抗敌”等故事，以简洁易懂的方式，用生物规律暗喻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以此批判因短视而无休止的内斗与内耗，并借物喻理呼吁团结抗敌。二是以讽喻解构文明伪装的讽刺叙事，用“多反差”揭“真本质”。此类教科书插图多为漫画，作为“笔杆抗战的先锋”^①，这些漫画不仅在内容上延续了讽喻时事的传统，更融入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时代精神，服务全民抗战的需要。^②例如，在生活书店的“战时读本 初级”（1937）、特种教育社的《战时国语读本》（1938）等战时教科书中塑造了诸如以人为食的假面绅士、满腹军火的战争狂人等形象（见图11），揭露“大东亚共荣”的文明伪装，抨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同时，一些插图中将侵略者比作被驱逐的狼狈逃窜的野狼（见图12），充分体现国人对殖民暴力的蔑视与反抗。



图11 1937年生活书店
《战时读本 初级》
（第四册）帝国主义插图



图12 1945年韬奋书店《战时新
课本：国语常识合编》（第二册）
八路军插图

（四）载意于图的符号叙事

符号叙事是一种通过符号系统来构建、传递和理解故事与意义的话语方式。符号作为一种携带意义的感知，能够直观体现事物、现象和意指的本质。教科书插图存在大量的典型视觉符号，这些符号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被组织起来时，同样可承担叙事功能，传达着超越其本身物质形态的深层信息。一是以符号隐喻延伸所指范畴。这类符号在图像中的运用，本质上是通过文化编码将具体“能指”与抽象“所指”相联结，拓宽符号的意义边界，调动读者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例如，中华书局的《小学国语读本 初级》（第一册）（1935）、生活书店的《战时读本 高级》（第四册）（1938）、新察哈尔报社的《历史课本 第一册》（1945）等战时教科书封面和插图中多次出现了朝阳、曙光、雄鸡、雄狮等符号（见下页图13、图14），这些符号及其背景和语境一起，除其指代的基本物质“所指”外，还代表着未来必将光明、抗战终将胜利的符号隐喻。二是以符号重复强化政治权威。诸如国旗、武器、军队、领袖肖像等代表性

① 丰子恺著，陈建军主编：《子恺谈艺 下》，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② 曹欣欣：《论抗战漫画》，《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

政治符号的反复出现,不仅赋予图像集群以统一的表意主题,还增强了主题的显著性与识别度,使主题更加突出、清晰、深刻,在国难语境下实现政治符号的日常渗透,起到巩固政治权威及集体认同的作用。三是以符号并置实现深度叙事。例如,战时的教科书插图常将雄狮与野狗、正义子弹与逃窜敌人等符号并置,强调概念之间的关联、反差、冲突或矛盾,制造画面的戏剧张力与意义空间,使符号间形成一种强关联性的“对话”关系。加之插图群中“像似符”“指示符”“规约符”等符号的穿插使用,进一步增强了符号作为教科书文本的表意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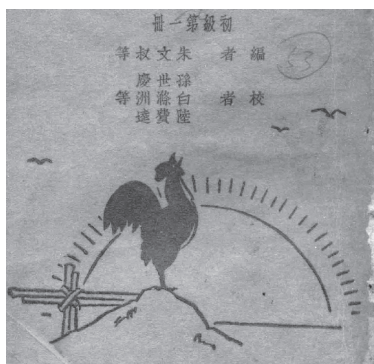


图13 1935年中华书局《小学国语读本 初级》(第一册)封面



图14 1938年生活书店《战时读本 高级》(第四册)最后胜利插图

(五) 寄情于图的情绪叙事

图像自诞生起便是人类表达、传递情感的重要方式,基于视觉激发共情、同情、愤怒、自豪、悲伤等情绪。战时的教科书插图尤其带有浓烈的情感投射,其图像叙事呈现出明确的意义结构与强烈的情感导向,更强调将情绪作为一种核心的结构性力量和传递意义的主要手段,以激发、管理和引导受众特定情绪反应为叙事目标,画面中情节发展、场景切换、节奏把控、诠释立场,皆服务情绪的积累、爆发、沉淀或转折。一方面,教科书插图在叙事过程中突出对立、强调秩序。这一时期的插图图像,带有鲜明的“普罗普叙事”结构特征,塑造了大量典型化、类型化、功能化的人物形象和事件情境,画面通常意义清晰、是非明晰、黑白分明,依托清晰的道德框架和明确的情节结构,构建出具有明确对立关系的叙事秩序。具体而言,插图通过人物形象与情节场景的类型化处理,建立起诸如“邪恶—善良”“阴暗—光明”“卑鄙—伟大”等鲜明的对立框架,以及“侵略—失败”“罪行—惩罚”“勤劳—美好”“正义—胜利”等一系列分明的因果秩序,据此形成了战时教科书插图叙事形态的底层情感逻辑(见图15)。另一方面,教科书插图的叙事方式强调话语积极、投射理想。战时教科书中的插图既包括对真实战争场面的描摹再现,也包括对驱赶外敌、保家卫国的理想演绎。例如,以日军败寇形象取代进攻侵略形象,以抗战胜利叙事替代国耻叙事,等等(见图16)。这些插图在绘制中对客观事实进行带有情感色彩的情绪化处理,使由视觉传达出的情绪成为“价值与行动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①,激发读者建立对是非善恶的视觉印象,从而实现“日本必败”“中国必胜”^②等主题深化和认同激发。

① Flam h, King D.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Routledge. 2005, p.42.

② 石鸥,廖巍:《课本也抗战:试论“战时教科书”》,《课程·教材·教法》2015年第9期。



图 15 1945年裕民印刷厂《初级新课本：国语
常识合编》（第二册）日本军阀插图



图 16 1938年特种教育社《战
时国语读本》焦土抗战插图

三、抗战时期教科书插图的叙事特征

叙事特征是图像在讲述故事、传递信息、表达情感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形式、内容与功能上的系统性特点。教科书插图的叙事特征反映叙事主体的立场侧重、体现叙事内容的价值倾向，并由此折射不同政权管理下教科书插图中知识构建的权力分配与意识形态的输出路径。其中，国统区与根据地教科书插图叙事特征各有侧重，前者强调权威秩序与精英领导，后者则突出群众动员与平等参与，形成了插图抗战叙事的两大倾向。

（一）国统区教科书插图：具有精英主义倾向，突出政治权威，强调政治符号

首先，国统区教科书插图的叙事目的以认识活动为主。在国统区统编教科书中，插图多采用纪实手法，偏重普及常识与传递既定事实，以精细化描绘手法直观呈现事物、场景、要素的实然样态，铺陈敌我局势，普及战争常识，充分发挥了教科书插图解释、表示、概括的基础表征功能，是一种具有较强工具性和教学辅助性的叙事材料。其次，国统区教科书插图构建了以“国家—军队—精英”为主轴的垂直政治符号体系。具体而言，中华民国国旗、国民党党旗等国民党政权象征符号通常被设计为插图的视觉中心，被塑造为具有仪式感和崇高意义的政治意象。军队形象则被塑造为捍卫国家、抵抗外侮、维持社会秩序的核心力量，通常以整齐划一、威武庄严的集体形象出现。与此同时，插图中频繁呈现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等精英群体向中华民国国旗致敬、赞扬军队的场景，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认同闭环。其中，国家象征作为政治核心符号，军队作为国家意志的坚实执行者，精英群体作为效忠与宣传的代言人，三者共同完成巩固政权、凸显权威的叙事任务。最后，国统区教科书插图暗含一定社会分工固化的政治隐喻。国统区的战时教科书插图具有一定社会角色类型化、社会职业等级化的倾向。例如，一方面，国统区的战时教科书插图描绘了大量国民党军队前线御敌的情节场面；另一方面，对敌后的工农阶层抗战力量的形象塑造极为“模糊”，对儿童、妇女的描绘则未涉及正面抗战内容，这些社会角色多数被刻画为需要保护的弱势对象，通常出现在遭受迫害、接受救济或进行后勤支援的场景中，而较少作为正式参与抗战的主体出现。这种视觉表征背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国统区意识形态中对社会分工与身份的固化认知，暗示了一种由上至下的权力结构和社会角色分配机制，于潜移默化中传递出保守的社会秩序观念。

（二）根据地教科书插图：具有革命现实主义倾向，体现全民抗战，彰显人民主体性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教科书插图叙事的目的是以全民动员为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图像叙事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①在根据地教科书中，主要采用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兼具写实性与象征性，其图像内容多围绕军民情谊、生产劳动、战斗训练与日常学习等现实场景展开，通过描绘人民参与武装、运粮、生产、放哨等抗战行为，歌颂全体劳动人民的劳动精神、无畏精神和抗争精神，肯定、鼓励并动员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力量积极投身抗战。其次，根据地教科书插图消解固化社会分工隐喻，塑造了抗战共同体群像的平行视觉主体。根据地教科书插图将视角聚焦广大的敌后战场，在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时代主题下，无论阶级身份、贡献大小，将士军官、士农工商、老弱妇孺都被平等视为抗战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群像中的一员，通过生产劳动与军事巡防的图像并置，打破“前线—后方”时空边界，造就了日常空间皆战场、生产劳动皆抗战的全民抗战图景，充分彰显了人民战争理论中军队与民众的团结和进步是战胜敌人的最根本因素这一核心观点。最后，根据地教科书插图彰显为人民而创、为人民而编、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基本遵循。根据地教科书插图始终坚持以人民作为表现主体、服务主体、接受主体，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主张、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价值立场，所刻画的人民群众身体舒展、斗志昂扬、可亲可爱，兼备身体尊严和精神尊严。这些插图拒绝将人民刻画为被动、受难或等待拯救的对象，而以英雄叙事、胜利叙事取代苦难叙事，突出人民的自主性与尊严感，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在文化表达中的主体性地位。

四、抗战时期教科书插图的叙事价值

站在抗战胜利80周年历史坐标上回望过去，战时的教科书插图早已超越了其说明教科书文字、丰富文本形态、优化阅读体验等基础功能，成为承载民族集体记忆、塑造国家精神谱系与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视觉表征。其高度符号化、情感化、仪式化的叙事方式，清晰勾勒了全民族抗战的视觉史诗，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提供了深层的文化资源与话语支撑，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

（一）文化价值：参与文化建构，刻画伟大抗战精神的鲜明视觉标识

文化价值是价值对象在规范和优化人的生命存在方面所具有的“好”的特质，是人在“文化”自己及周围世界的过程中创造、追求和遵循的价值。^②战时教科书插图不仅完成对视觉符号的整理与贮藏，更是凭借视觉形态对主体思维、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独特建构功能^③，超越对现实的镜像复刻，发挥参与国家文化的意义生产、价值传递、身份塑造与秩序维护等能动性实践。

一是以图证史，记录日本侵华罪证。战时教科书插图作为一种历史记录工具，成为连续记录世界史、二战史、公众史的官方视觉档案，履行着历史书写、事实见证的重要历史使命。这些图像通过写实性描绘与符号化表征，客观呈现了日军轰炸、屠杀、掠夺等暴行场景，以及中

① 刘云彬：《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图像叙事的百年回溯》，《理论导刊》2021年第12期。

② 孙美堂：《从价值到文化价值：文化价值的学科意义与现实意义》，《学术研究》2005年第7期。

③ 周宪：《视觉建构、视觉表征与视觉性——视觉文化三个核心概念的考察》，《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国城乡遭受破坏、民众流离失所的真实状况。这些图像以无可辩驳的视觉证据去蔽存真，揭露了侵略者的反人类罪行，在史料层面为中华民族抗战历史建构了坚实的叙事基础。

二是以图塑形，建构中华民族形象。战时教科书插图叙事作为国家叙事的重要形式，不仅承担着书功过、记善恶、明是非的历史使命，还通过遴选典型事件、突出集体行为、塑造人民英雄等方式，系统勾勒了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这些“视觉”携带着主体的欲望和客体的价值，并且蕴含了主体的认知模式，最终扬弃由图像的物质性所形成的“国家形象”^①，展现了中华文明于存续危局中所呈现的精神气度与文化尊严，深刻参与并影响了中华民族在反抗压迫过程中的自我认知与身份重构。

三是以图凝魂，传承精神标识符号。精神标识是中华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它能够将内隐、抽象、无形的文化精神外显化、直观化、有形化，让人们能够切实地感知、识别和描述它的存在。^②战时教科书插图实现了对抗战精神从抽象理念到可视符号的系统转化与永久定格，凝练出一套高度可辨识、可传播、具象化、符号化的视觉符号体系，构成了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视觉符号体系和视觉化文化基因，成为一代代人可感知、可认同的文化象征，从而在符号层面保证民族精神的连续性与传承性。

四是以图延脉，促进了文化传播与内化。教科书是覆盖力最强的国家话语传播渠道之一，其中的插图全面促进了抗战文化的高效社会文化传播与深层价值内化。对外，以直观有力的图像语言塑造了正义、不屈的国家形象，向国际展现了中华民族反法西斯战争的视觉图谱；向内，则通过日常化的教育渗透，将民族危亡的历史事实与团结抗争的价值理念，反复植入青少年群体的认知图式之中，有效强化了社会成员的精神凝聚与国家认同。

（二）凝聚价值：激发情感共鸣，构筑群体层面的集体符号记忆

民族危亡之际，面对迫切的革命需求和信息传播挑战，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文化资源，都会被纳入抗战救国的总动员体系之中。教科书作为塑造世界观、价值观的最广泛、最普遍工具，自然承担着凝聚民心、提振士气、构建抗日战线的政治使命。

一是输出意识，实现理念价值精神的实体转化。抗战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认知尚未健全的儿童对于战争形势、国家命运、抗战共同体等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认知上的模糊。通过图像叙事，教科书插图将人民群众对于抗战的未知、淡薄、模糊、概念性印记，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以更为直观化、具象化、生动化的形式有效呈现出来，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可感知、可效仿、可参与的实践对象和确证依据。

二是动员情感，打造跨越认知差异的情感纽带。毛泽东曾在文章中谈到图像的宣传普及作用，认为“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演讲，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③教科书插图因其自身的形象性、具象性、情节性，可打破地域、阶层、年龄、代际差异，成为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奋起反抗的武器，唤起人民群众的悲悯、愤怒、崇敬、感动等强烈情感。这种基于视觉的情感共鸣，不仅强化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情感连接，更以情感动员推动社会动员，以情感为纽带汇聚全民参与的磅礴伟力。

① 李红：《图像中的国家形象：基于视觉框架的考察》，《新闻大学》2022年第3期。

② 向玉乔：《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中州学刊》2023年第12期。

③ 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三是增进认同，共筑民族尊严的集体记忆符号。集体记忆是个体记忆的总和，是群体过去全部认识的总和，决定着这一集体对自身的认同。战时教科书插图作为一种国家层面的公共视觉形象体系，通过对文化符号的系统化整理与叙事化呈现，使插图这一符号集合成为能够贮藏和繁衍集体记忆标的“记忆场所”^①，在不断的符号再现和反复强化中给读者留下深刻的视觉烙印。这些视觉烙印构成的集体记忆，催化群体形成共同意志、信仰和社会心理，从而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历史认同、身份认同、使命认同和文化认同。

（三）育人价值：启智润心，为学以报国铸牢坚实魂脉根基

教育价值是中小学教科书插图的根本价值，也是教科书插图得以存在的基础。战时教科书插图构建了具有强烈时代印记与意识形态指向的视觉化育人语境，这些图像以高度典型化、情感化与象征化的叙事手法，将战争现实、民族命运与国家诉求转化为可被学生感知与内化的认知图式，从而在知识传授、情感激发与价值引导的多维互动中，实现“启智”与“润心”的育人目标。

一是赋能文本增值，强化教科书育人功能。一图胜千言，相较于纯文字表述，图像叙事配合语言叙事，充盈了教科书的文本形态，使教科书单位页面中能够呈现包括基础信息、视觉信息、情感信息、象征信息、隐喻信息等在内的多元感官信息，不仅拓宽了教科书的信息容量与传输渠道，还增强了教科书的可读性与可教性，降低学生认知负荷，提升学生学习效率，涵育学生基础视觉素养，提升教科书的育人效果。

二是传递理想信念，培育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符号表达是符号传递的前提。战时教科书插图通过图像叙事，实现了对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与必胜信念的视觉塑造，弥补了言语符号的抽象性、概念性和局限性，通过视觉浸润深度参与学生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化抽象为具体、化复杂为简单、化理性为感性，产生“形塑”与“群塑”的效应^②，从而在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有效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深沉的家国情怀，为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筑牢认同根基。

三是唤醒时代使命，树立正确历史观与国家观。战时教科书插图叙事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意理内核与感性形式，其“意”“形”统一的话语方式，是一种连接历史与当下、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载体，时至今日仍可为当代青少年正确认识国家历史、认清国际形势、坚守国家立场提供深刻的价值锚点。记录历史保存记忆，跨越时空启迪未来。教科书插图的抗战叙事作为服务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资源，还可为学生正确认识历史提供“视觉基石”，激发学生珍惜当下、维护和平、建设国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战时教科书插图这份中华民族特殊的视觉遗产，以具象化的图像叙事无声记录了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卓绝斗争，也作为视觉史证，成为了抵御历史虚无主义、固化集体记忆的重要力量。战时教科书插图研究不应止于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范畴，未来可通过数字化重构、跨媒介传播等方式，让这些蕴含着民族精神的老课本，成为当代青少年感知历史温度、铸牢

① [法] 诺拉著，黄艳红等译：《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页。

② 罗红杰：《话语·图像·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着力点》，《湖北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家国认同的“活教材”，使诞生于烽火中的伟大抗战精神，在新时代文化自信建构中持续焕发力量。

（责任编辑：李 洁）

Textbook in Adversity, Illustration for Resistance: Narrative Study on Textbook Illustration During the 14-Year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Yu Hongliang, Li Xintong

Abstract: The image narrative analysis of textbook illustrat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decoding the national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discerning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narrative themes of the illustrations revolve around the cruel atrocities of the aggressors, the heroic demeanor of the righteous forces, the towering images of heroic leaders, and the spirit of resistance, which are realized through spatial, instant, symbolic, semiotic and affective narrativ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Kuomintang-controlled areas and the base areas had different emphases, with the former exhibiting elitist tendency and highlighting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symbols, while the latter demonstrating revolutionary realism tendency and reflecting the resistance of the whole nation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people. In terms of value, the image narrative of the illustrations, as a precious legacy of the war, possesse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value of shaping the great spirit of the war, the emotional accumulation value of fostering collective symbolic memory at the group level, and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forging a solid spiritual foundation for studying to serve the nation.

Key words: textbook illustration; image narrativ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ollective memory

《教育史研究》入选北京师范大学“一流学术论文期刊目录”

【本刊讯】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基本精神，北京师范大学修订颁布了新的《教学科研岗位晋升管理办法》和《教育学部教学科研岗位晋升实施细则》，明确将《教育史研究》（季刊）列入“一流学术论文期刊目录”。这意味着《教育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32种教育类CSSCI期刊、SSCI期刊、SCIⅠ区/Ⅱ区期刊等并列，成为该校教育学一级学科教学科研岗位晋升代表性成果类型中的Ⅰ类成果的来源期刊。

《教育史研究》编辑部